



7版 人民日报

弘扬优良传统 深化政治整训 特刊

2025年12月15日 星期一

责任编辑/袁丽萍 李汝海

古田会议永放光芒

谭政：走正路、办正事、扬正气

■ 院 浩



为将之道

1927年春，一位刚20岁出头的谭姓小学教员，来到武汉的一所军营报名从军。不知是不是临时起意，在填写报名花名册时，他将原名“世铭”改为单名“政”。

这个年轻人便是谭政。那个“政”字，成为他一生奋斗与风骨的真实写照。

“秋收时节暮云愁，霹雳一声暴动”。投笔从戎刚满半年，谭政就跟随部队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然而，革命斗争充满艰辛。当这支受到严重挫折的队伍摆脱敌人围堵时，最初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不足1000人。

队伍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。在人群中，谭政目睹了一位“又高又大的人”站出来给官兵作讲演。激昂的讲演一下驱散了人们的沮丧与失落，令他情不自禁地拿出笔纸记录下来。谭政是何其幸运，因为他此时见证的正是毛泽东同志带领这支队伍走出至暗的一刻，也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一次闪光的瞬间。大概从那时起，谭政便随着这道光明，与政治工作结下了缘分。

严格来说，谭政第一个政治工作职务是红一团政治部的宣传员、分队长。彼时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刚上井冈山，迫切需要站稳脚跟。而要让当地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，就要开展好革命的宣传工作。红军打到哪里，谭政满怀热情干宣传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。有人回忆那时谭政的样子——身着军装，身上斜挎着一支盒子枪，胳膊窝底下夹着一捆写好的标语，大街小巷张贴。

1928年2月，因工作表现出色，谭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秘书，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整理文稿。在从事秘书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谭政亲眼见到毛泽东是如何思考和处理党内党外、军内外错综复杂的问题。他后来曾回忆毛泽东的工作状态——“所有问题的提出与回答，都是有针对性的。但是落实到文字，写成稿子，不知需要多少次的反复。常常听了些意见，毁掉重写重抄……”正是这段宝贵经历，培养了谭政实事求是、亲力亲为、注重调研的作风，为他日后开展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红四军初入赣南时，部队筹粮筹款异常艰难，而革命军队的纪律也绝不容破坏。时任红四军第31团团党委秘书的谭政提出“打收条”的办法：部队使用群众物资必须付款；如无现款，就向群众“打收条”，写明所耗粮食数量，承诺日后偿还；群众亦可凭收条至苏维埃政府抵交公粮。这一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做法，后来在红军中广泛推行，既解决了部队的现实困难，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。

1929年冬，红四军准备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，谭政受命参与会议材料的准备。谭政跟着毛泽东深入各部队做调研，茅草屋、大树下……都成了让基层官兵敞开心扉、畅所欲言的地方。调研结束后，谭政将座谈、调查得来的情况归纳整理，并附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为毛泽东起草具有深远影响的《古田会议决议》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

反“围剿”期间，年轻的谭政已成为军政治部主任、师政委。长征开始后，他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政委。在他的影响下，部队士气高昂、纪律严明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即便在条件极端艰苦、作战异常繁

的长征途中，谭政始终保持“动笔”的习惯，每月撰写总结报告与政治报告，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政治工作。一些重要战斗中，这位年轻政委亲赴前线冲锋陷阵，使他在官兵心中享有崇高威望。长征中与他搭档的第1师师长李聚奎曾评价谭政：“你别看他有点书呆子气，实际上这个人很含蓄，很坚韧。”

坚韧是对革命事业的坚韧，含蓄则是对个人光环的含蓄。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，红军开始受到世人关注。一些国内外媒体来到根据地采访红军将领，而谭政却极少在记者面前露面。后来他女儿谭星明看完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后，好奇父亲这个老红军为何没能在书上留名。谭政回应女儿说：“接受斯诺采访的战士们，可不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功劳、让后人记住他们，他们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革命，了解红军。长征路上，战场上，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，他们才是真正勇士！但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？”

一颗谦虚的心里，始终流淌着对革命事业无限担当的热血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八路军、新四军急速扩充，人民军队在快速壮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隐忧。此时的谭政已经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。察觉到有些可能导致“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，被抹杀，影响政治工作威信”的问题后，他很快奔走到基层，再作深入调研。在一些会议上，谭政毫不客气地指出部队存在的“朝气太足、暮气太多”“官兵隔阂、不团结”“剥削意识、腐化思想”等突出问题。由于掌握情况具体充分，几乎每一个点出的问题，他都能清楚说出实际的事例，分析背后原因。

揭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这是让



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(雕塑，矗立在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)

公治凡桐摄

延安派来的老红军

■ 陈青山

1940年夏秋时节，正当海南抗日斗争亟需干部的关键时刻，党中央及时选派了参加过长征的庄田、李振亚、覃威等领导干部，以及一批电台、机要、军械技术人员来海南工作。庄田等同志一到海南，就显示出他们出色的军事指挥才干和政治工作才能。

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，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。可是，(1938年)云龙改编之后，国民党方面派来了一些副职，不准我们搞政治委员制度。为了坚持统一战线，我们做了让步。后来，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，他们派来的副职相继撤离了，但我们的政治工作制度还没有恢复。庄田、李振亚等来琼之后，向

冯白驹同志建议，把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尽快恢复健全起来，把党的组织在连队公开。李振亚同志曾强调说：“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们战胜敌人、壮大自己的强大武器。现在我们把工委制度和政治机关都取消了，岂不是把重武器都丢了？不行，还得像八路军那样，尽快恢复起来才好。”特委和部队政治部经过认真研究，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，把总部政训室改为政治部，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，连队设支部、大队设总支、支队设总支，还专门举办了三期党支部书记训练班。

记得当时我们宣传部门办有《战斗生活》和《每周时事》等刊物，后来还编了个《军政杂志》。李振亚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我们编刊物，还亲自写文章、审稿、定稿。庄田、李振亚对基层的政治工作也很关心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就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哪里，经常和战士们促膝谈

心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。他们反复强调要下功夫抓好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还亲自备课，组织大家学习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《论持久战》，用理论武装战士们的头脑。

庄田是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总队长，是冯白驹同志的得力助手。机关、部队的许多同志都把庄田说成是“青年干事”，这是因为他性情豪爽、活泼好动，很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。一有时间，他就给青年人讲红军长征和八路军英勇打日寇的故事。庄田还爱唱歌。他走到哪里就把革命歌曲唱到哪里，用歌声和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把我们和延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李振亚、覃威都不是海南人，不懂海南话。为了和干部战士沟通思想、联络感情，他们就拜传令兵、勤务员为师，学会了半生不熟的海南话。他们用“半咸

淡”的海南话跟同志们开玩笑、讲故事，常让人笑得肚子发痛。他们和干部战士亲热得像亲兄弟一般，大家有什么心事都乐意向他们倾诉；有什么疙瘩解不开，也主动向他们请教。他们和干部战士打成一片，时时处处都以普通一兵来严格要求自己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。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差，每顿饭每个人能分到一两个饭团就不错了。他们和战士一样，谁想多给他们一个半个，绝不答应。有段时间，李振亚同志病倒了，勤务员看着他又黑又瘦的脸，心里很难受，趁副官处宰猪，去要了猪肝、猪心，煮好给他送去。他却叫人原封不动地送回，还严厉批评了勤务员。庄田、李振亚都有马，可是他们自己很少骑，每逢进军打仗，不是给战士驮东西，就是让给伤病员骑。

庄田、李振亚、覃威等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来到了海南，为海南抗战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(作者时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政治部宣传科长，文章摘编自《来时的路：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》“五指山上现红霞”卷，有删节)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
随 感

政治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有人可能会谈到电视剧《功勋》中《能文能武李延年》的主人公李延年。他在炮火硝烟中，用“战斗日记”记下每一位战士的功劳，把“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”作为带兵信条，用朴实的话语鼓舞战士，带出能打仗、打胜仗的连队。当然，也有人会列举出身边的一些优秀政治干部。

立起政治干部的好样子，要求政治干部要多向榜样学习，成为做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，把政治工作的威信威力发挥出来。

把“真”字刻印在心。“真者，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。”政治干部作为“党代表”，对党要真忠诚而不是伪忠诚，对党的创新理论要知行合一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，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、虚假应付。教育别人首先要自己真受教育。1938年，周恩来同志在《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》中严肃指出：“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，这次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，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。”现实中，一些政治干部的党代表意识不强、政治意识淡化；理论学习表态化、空泛化、功利化，学用脱节，成为只说不练的“假把式”；教育别人说得头头是道，自己却没有入脑入心、触及灵魂……毫无疑问，这些都会损害政治工作的威信，影响政治干部队伍的形象。

让“正”字立起来。“政者，正也。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”

习主席指出：“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、弘扬正气，坚持以信念、人格、实干立身。”政治干部是开展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形成一种风气、一种导向，更要时刻刻注重加强党性修养、检身正己、立身为旗，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，去引领人、感召人；还要练就一副铁肩膀、宽肩膀，担急难险重任务，关键时刻冲锋在前，敢喊出“跟我上”；在处理涉及官兵切身利益问题时，公道正派，依法依规办事，弘扬风清气正，以此赢得官兵的信赖和支持。

在“实”字上下更多功夫。政治工作能否得到官兵的认可，不是看说了什么，而是看你做了什么、怎么做的。有的政治干部对基层急难愁盼的事情，或者漠视不理，或者只表态不行动、有上篇无下文、口惠而实不至，或者推脱绕、空转虚耗、形式主义、官僚做派让官兵很反感。官兵利益非小事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说服人的不仅仅是大道理，更是一件件可感可触的小事情。政治干部一定要说实话、办实事、做老实人，不尚空谈、不务虚功、不兴伪事，做工作多一些温度

实感，走好群众路线，尊重官兵、取信于官兵，以务实的作风凝聚军心士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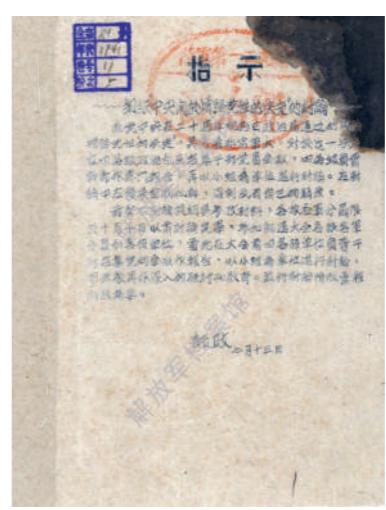
以“新”字求突破。创新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不竭动力。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，管思想的工作，既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，又要抓住本质问题、现实问题，紧跟时代的脚步，创新方式方法，让生命底蕴永葆生命力。政治干部在思想观念上要知变求变，与年轻官兵同频共振；在形式上寻求多样性，不但要“面对面”，还要“键对键”；在内容上，引入智能化手段，让官兵多一些量身定制、个性化体验。

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，是我军的最大特色、最大优势，对于我军从小到大、从弱到强、从胜利走向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，只能加强不能削弱。因此，政治干部要进一步强化对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认识，给自己立起更高标准，提出更严要求。正如马克思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里写的那样：“如果你想感化别人，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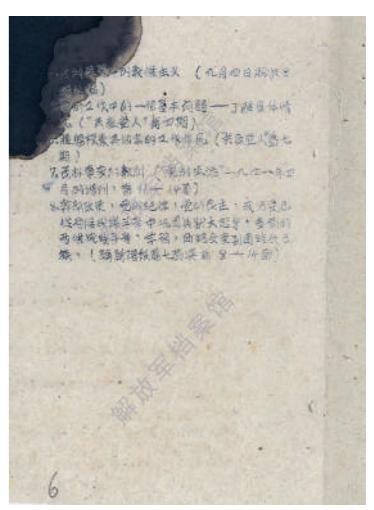
档 案

人民军队贯彻落实整风精神的实证

■ 周颖艺



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于1941年7月13日作出《关于组织“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”的讨论》的指示。



解放军档案馆藏

1941年5月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，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。7月1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，首次对党员的党性锻炼提出较为全面的要求。这一决定直指当时革命队伍中存在的独立主义、个人主义与无组织状态，号召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加强党的团结，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作风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。

随后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，学习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迅速成为重要政治任务。其中，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于7月13日作出《关于组织“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”的讨论》的专门指示，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召集干部党员会议，由各级负责干部作专门报告，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，指出当前“巩固党的主要工作”的内容和重要意义。

违反党性的具体表现，提出“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严重倾向”必须做到“力戒空疏力戒肤浅，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”“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、集中性和服从党中央决定和领导的重要性”“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”以及“加强党的纪律教育”。同时，指示还列出讨论题目，要求“在讨论中应发展自我批评，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”，将抽象的理论学习转化为具体的党性锻炼。在师部机关、干部们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学习，基层连队也通过集体学习、小组讨论等形式进行思想教育，结合参考材料，开展对照检查。

这份指示，以强烈的现实针对性，成为人民军队贯彻落实整风精神的生动例证。通过自上而下的学习讨论，广大党员对增强党性的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延安派来的老红军

■ 陈青山

冯白驹同志建议，把部队政治工作制度尽快恢复健全起来，把党的组织在连队公开。李振亚同志曾强调说：“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我们战胜敌人、壮大自己的强大武器。现在我们把工委制度和政治机关都取消了，岂不是把重武器都丢了？不行，还得像八路军那样，尽快恢复起来才好。”特委和部队政治部经过认真研究，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，把总部政训室改为政治部，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，连队设支部、大队设总支、支队设总支，还专门举办了三期党支部书记训练班。

记得当时我们宣传部门办有《战斗生活》和《每周时事》等刊物，后来还编了个《军政杂志》。李振亚同志满腔热情地帮助我们编刊物，还亲自写文章、审稿、定稿。庄田、李振亚对基层的政治工作也很关心。他们走到哪里，就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哪里，经常和战士们促膝谈心，提高战士们的政治觉悟。他们反复强调要下功夫抓好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还亲自备课，组织大家学习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《论持久战》，用理论武装战士们的头脑。

庄田、李振亚、覃威都不是海南人，不懂海南话。为了和干部战士沟通思想、联络感情，他们就拜传令兵、勤务员为师，学会了半生不熟的海南话。他们用“半咸

